



第一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後
的國際形勢

討論共和國前期的外交，不能不先談一下那個時期的國際形勢。因為所謂外交，顧名思義，也就是對外關係和國際往來。國際形勢對外交的影響並不亞於內政對外交的影響。所以要談一個時期的外交，就必須了解當時的國際背景。然而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國際形勢千頭萬緒，這裏不可能作系統闡述，更不會面面俱到。我只想就幾個有不同看法的問題談點個人意見，並不是說這一段時間的國際形勢只有這幾個問題，也不表明哪個重要或哪個次要。作此說明後，就讓我們討論以下幾個問題：我們所處的時代；全球化與中國；二十世紀的國際形勢和社會潮流；美蘇冷戰與中國。

我們所處的時代¹—— 共和國誕生在兩個時代的交接期

共和國成立六十年來，分為前後各三十年兩個明顯不同的階段。前一階段，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雖也取得一些成績，但卻是犯有嚴重錯誤和存在沉痛教訓的三十年。後一階段，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進行市場化的改革開放，雖然缺少政治改革，但還是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達到初步小康和成為世界經濟大國的三十年。造成兩個階段不同的重要原

1 關於時代問題，二十多年前我曾將幾次報告整理成一篇文章，以〈我們所處的時代〉為題發表。後來又和其他有關文章合併成一本《論和平與發展時代》的書，由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印出。離休後由於改行學黨史，有些觀點如對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看法，已發生重大變化。但對時代問題的理解並沒有改變，後來又作進一步發揮，見〈我們所處的時代〉一文，載於《爭議下的國際問題觀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3-70頁。（編按：本章寫於2010年1月，作者2017年7月再修訂）

因，就是對時代及其特徵的判斷不同：前者堅持仍然是戰爭與革命時代，因此繼續以世界革命為總路線和總政策；後者認定時代特徵已轉變成和平與發展，總路線也改為集中力量發展本國經濟並維護世界和平。不同的判斷導致不同的結果，證明了對時代的認識和判斷的重要。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正好是戰爭與革命時代的結束及和平與發展時代的開始。這就是建國前後面臨的國際形勢的主要特徵。

二十世紀分為前後兩個不同的時代

對時代的理解和劃分

我們這裏談的時代，是十九世紀末以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個傳統提法，在理論上和政治上都被置於首位的一個重要概念。各國共產黨在制定戰略方針時都是從對時代的判斷出發，中國更不例外。即使西方資本主義大國在制定其國家戰略特別是對外戰略時，首先考慮的也是總的國際形勢及其發展趨勢，不管是不是用時代這個名詞。所以，我在這裏還是採取老辦法，從我們所處時代談起。

那麼，什麼是時代呢？簡單說來，時代就是指對一個歷史時期世界形勢和國際關係中客觀存在的基本特徵和主要趨勢的判斷。

時代特徵的轉換交替，是基於世界歷史發展的規律，是一種客觀演變，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們只能對時代特徵做出正確判斷和適應，而不能隨意創造或改變它們。但是有不少學者在談到時代和時代的特徵時，卻不是這樣看問題，反而認為時代和時代特徵是由領導者的主觀意志決定的，因而把戰爭與革命時代跟和平與發展

時代的交接定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因為在這之前，毛澤東和黨中央都肯定我們處在戰爭與革命時代。直到八十年代中期，鄧小平才提出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隨後由黨中央定為世界主題和時代特徵。實際上，不論叫時代特徵還是叫國際形勢發展總趨勢，都是由客觀存在的歷史條件決定的。人的意志，即使是重要大國領導人決定的中心任務，也只能對它產生某些影響，絕不能改變它的發展方向。所以說，新的時代特徵「和平與發展」替代舊的時代特徵「戰爭與革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世界變化的結果，而不是出於人們的主觀判斷。

由此觀察時代，可以看到和認定：第一，它是國際性的，涵蓋全世界，而不是指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例如中國有毛澤東時代，就只適用於本國。第二，它具有全面性，是國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發展的總趨勢，而不是某個方面的發展階段，如信息時代。第三，它具有決定性。世界上各種不同甚至相反的趨向和事態經常都在發生和存在，包括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但都不可能扭轉和改變時代的基本特徵，而只能受它的制約。第四，它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就是說時代和體現它的基本特徵存在於一個比較長的歷史階段，不會輕易改變。因此，對時代的判斷是着眼於長期戰略的根本性判斷，不能碰到一點風吹草動就動搖以至改變對時代的認識，否則就會犯大錯誤。

這次時代的交替，也就是舊時代的基本特徵已失去作用，而為新時代的基本特徵所取代。這個轉化過程，準確地說，可以定在二戰結束到民族民主革命高潮的頂峰已過的1950年代初。因此，過去的二十世紀就分為各佔一半的兩個時代。前期被稱為戰爭與革命時代，因為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並引起了兩次世界革命高潮，而且社會經濟發展也處於相對停滯狀態，還爆發了三十年代的大蕭條。

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作為時代特徵的和平與發展就已正式代替了戰爭與革命。這時不但大戰已經停止，而且交戰國也大多已先後醫好戰爭創傷。同時戰爭引起的世界性民族民主革命高潮，也隨着殖民主義體系走向崩潰而衰落。這期間，許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用和平改良的方式推動了社會的進步。正是通過時代特徵的替代，世界才能在和平的國際環境下，實現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發展，使人類社會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漫長時期。

戰爭與革命時代，被共產國際和各國黨所肯定，從來沒有什麼爭議。例如毛澤東就一直是這樣認為的。延安時期被視為毛澤東思想奠基作的《新民主主義論》說，「現在的世界，是處在革命與戰爭的新時代，是資本主義決然死滅和社會主義決然興盛的時代。」歷史的發展雖然證明，毛澤東對世界革命前景的估計屬於主觀臆斷，但他當時接受列寧、斯大林對時代的判斷卻並沒有錯。這是因為，把二十世紀上半期稱作戰爭與革命時代是基本上符合歷史實際的。

為什麼說戰爭與革命時代的提法基本上合乎那個時期的歷史實際呢？

第一，可能成為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兩次世界大戰接連發生在二十世紀前半期。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說，戰火延續六年，先後有六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單位參戰，波及20億人口（佔當時世界人口的80%），戰地面積廣達2,200萬平方公里，交戰雙方動員兵力多達1.1億人，因戰爭死亡的軍民超過5,500萬，造成的物質損失估計達時價14萬億美元。這裏還沒算戰爭帶來的其他後果和戰前備戰與戰後恢復的影響。拿我們中國來說，單是八年抗戰中遭受日本侵略者屠殺的軍民就有2,100萬，給我國造成的物質損失在6,000億美

元（按1937年的價格）。而且日本的軍事侵略和中國的局部抗戰，早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就已開始。除抗日戰爭外，整個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還一直處於各種不同性質的內戰狀態中。因此可以說，這一時期在佔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國，一直處在典型的戰爭與革命時代。

第二，二十世紀上半期，世界經濟社會發展處於相對停滯狀態，一度較快發展的國際化進程受到嚴重阻礙。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比起二戰來規模和破壞都小一些：參戰國家33個，捲入人口13億、造成死傷各2,000萬。但它破壞了世界經濟，促成了1930年代的大蕭條，使世界經濟倒退到二十世紀初的水平。以國際化來說，世界貿易在1889到1913年差不多翻了一番，但1913–1938年世貿出口的年均增長卻只有0.7%，更不能和二戰後1950–1973年的年均增長9.1%相比。十九世紀末興起的對外直接投資，在二十世紀前期已基本陷於停滯。1938年只有263億美元，到1950年才增長到544億美元。總之，二十世紀前期的世界，是處在衝突和戰事叢生，經濟社會發展緩慢和遭到嚴重破壞的時代。²

第三，兩次世界大戰引起了兩次世界性的革命高潮，嚴重的經濟危機也導致許多國家進行社會改革和調整，這就使二十世紀上半期稱得上是一個革命和大變革的時代。一戰結束，正如恩格斯預言的，曾造成大批皇冠落地，特別是俄、德、奧匈和奧斯曼四大帝國垮台，歐洲許多中小國家獲得獨立。亞非等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大都興起了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雖然多數遭到失敗。作為最大的資

2 這裏所引經濟資料，散見於李琮著和主編的《李琮集》（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當代資本主義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丹·耶金、約·斯坦尼斯羅著，段宏等譯《制高點》，（外文出版社，2000年）等書，不一一加註。

本主義國家美國，為擺脫1930年代的大蕭條，實行「新政」改革，其他一些國家也起而仿效，被一些人稱為「凱恩斯革命」，使資本主義的自我調節和改良進入一個新階段。二次大戰引起的世界革命高潮更具劃時代的性質，世界殖民主義體系徹底崩潰，一百多個國家獲得獨立，民主化運動也改變了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的面貌。

和平與發展時代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特徵的客觀歷史根據。

先談和平。

二十世紀下半期，世界大戰早已結束，而且戰後規模最大的國內戰爭和國際局部戰爭也都停止。中國解放戰爭，雙方投入兵力一千三百餘萬，戰火遍及全國。此後世界上就再沒有規模超過這次的戰爭了。以國際戰爭來說，歷時三年多的朝鮮戰爭恐怕是二戰後規模最大的一次。雙方參戰國家，「聯合國軍」方面為16個，另一方為毛澤東說的「三駕馬車」——中、朝、蘇聯。雙方參戰兵力近300萬，死傷也各在100萬以上。越南戰爭只是時間更長。其他局部戰爭規模都在朝戰之下。而且作為時代特徵的戰爭，從來都是指的世界大戰，上述的國內戰爭和局部戰爭還不算數。鄧小平就說，「因為我們講的戰爭不是小打小鬧，是世界戰爭。打世界大戰，只有兩個超級大國有資格，別人沒有資格。中國沒有資格，日本沒有資格，歐洲也沒有資格。」³二十世紀下半期，雖然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大軍事集團一直進行擴軍備戰，使世界長期處於冷戰狀態，但終究沒有挑起大戰，而且國際形勢還越往後越趨向緩和，直到冷戰

3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04頁。

結束。因此，從二戰的停止到1950年代初戰爭善後工作的基本完成，整個說來，世界就已進入了和平時期，人類也從此過上了長期的和平生活。據報導，美國馬里蘭大學一個研究小組最近收集的資料顯示：我們眼下處於1950年代以來全球暴力的最低點。⁴哈佛大學專家史蒂文·平克 (Steven Pinker) 更認為，我們或許生活在有人類以來最和平的時期。人們覺得處於恐怖中是由於，暴力雖然逐漸減少，但信息卻不斷激增。過去二十年的信息革命，使一次爆炸也可成為突發新聞。

世界在過去半個世紀以至今後長時期能夠維持和平、避免大戰，是由於二戰後國際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一是人類，特別是世界大國人民的覺悟和進步有了空前提高，成了維護和平的主要因素。這並不是一句空話。因為歷史畢竟是人們自己創造的，人的覺醒變成了巨大的和平力量。即使對大國來說，人也不單指人民群眾，連領導人和統治集團都再沒有打世界大戰的主觀意願。在冷戰時期，被鄧小平說成有資格打世界大戰的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就一直避免迎頭相撞。二是主導世界的資本主義本身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由傳統資本主義變成了現代資本主義，大大提高了自我調節能力，能夠緩和以至解決各國自己以及相互間的一些矛盾，而無須訴諸戰爭。這說明資本主義仍有強大的生命力，並沒有走向死亡（垂死），也否定了列寧、斯大林關於帝國主義戰爭不可避免的論斷。三是國際化和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國際秩序和遊戲規則得到不斷改進並漸趨合理，使各國的利益互相滲透、日益融合，因而列強已沒有必要也不可能為爭奪地盤和市場而互相廝殺。四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存在和不斷更新，以及其他軍事技術的迅猛發展，都成了制止

4 《參考消息》，2008年5月5日。

大國之間戰爭的手段。所有這些，就使人類已經過了七十年的和平生活，看來今後也不大可能再爆發世界大戰。

再說發展。

也是1950年代，前一時代特徵的革命已為後一時代特徵的發展所取代，只是這個轉變的時間長一些，不像戰爭轉化為和平那樣快捷和明顯。而且革命和發展也不容易分得太清，因為廣義地說，革命本身就屬於社會發展。不過作為時代特徵，兩者的含義還是完全不同的。革命總是指民族獨立、政權更迭和制度改變，方式多用暴力。發展則只指經濟的增長和政治、社會、文化的進步。由於二戰引起的世界革命高潮屬於民族民主革命性質，所以主要表現為殖民主義體系的崩潰和被壓迫民族取得國家獨立。而這些，可以認為在1950年代初期就已經基本實現。因為佔亞非殖民地半殖民地人口五分之四以上，包括主要國家中國、印度、印尼、巴基斯坦以及許多西亞北非國家，都已在1950年前獲得獨立。出於形勢所迫，英法等老牌殖民主義不得不先後承認它們所屬非洲國家的獨立。例如法國在1960年的半年內就放棄了對12個非洲國家的殖民統治。可見，1950年代後的殖民主義已屬強弩之末，在國際事務中已不再起重大作用。因此，把時代特徵從革命向發展的轉化，定到1950年代，應看作是不爭的事實。而據2008年2月16日《經濟觀察報》載陳志武教授訪談，其中引證英國著名經濟史專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從公元元年左右到1880年，世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才增加一倍（從500美元到1,100美元），從1889年到2000年，卻增加五倍。還有兩個帶標誌性的事情值得一提，就是1950年代中期萬隆會議的召開和發展中國家組成的第三世界的興起。連第三世界這個名詞也是1952年才由一個法國人類學家費雷德·索維爾（Alfred Sauvy）提出來的。他在一篇題為〈三個世界、一個星球〉（Trois

mondes, une planète) 的文章中給處於中間狀態的國家群體取了一個名字，叫第三世界，後來也就在全世界傳開了。所以李琮在《第三世界論》(世界知識出版社)中也明確指出，「第三世界是1950年代初形成的」。

發展之所以代替革命成為新時代的特徵，首先是由於和平的國際環境。本來和平與發展兩個特徵就是不可分的，和平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和平的基礎，兩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互相維護。其次是科學技術的進步。戰後的新技術革命推動經濟快速發展和對社會生活產生巨大影響，是人們都體會到了的。第三是經濟市場化。市場化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是二戰後一個大的世界潮流。凡是順應潮流、實行市場化的國家，經濟必然發展得快；凡是反其道而行的，發展就一定慢甚至倒退。二戰後頭三十年，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就都吃了沒有市場化的虧。直到1980年後，市場化才在全世界迅速展開，捲進的人口從這以前的6億增加到二十世紀末的60億，只剩下極少數幾個國家排斥對內對外的市場化而自甘落後。第四是政治民主化。這是二戰後又一大世界潮流，成為維護和平和促進發展的一個重要支柱。戰前只有美英法等少數幾個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國家，而且民主內涵還很不完備，單以選舉論，就有財產、性別、種族等的歧視和限制。戰後，從七十年代起，民主化才得到迅速擴展。還以選舉制為例，1975年全世界民選政府只有30個國家，到2005年已增加到119個。民主化的潮流不但波及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如拉美多數國家在1980年代就由文人政權替代了軍人政權；1989年53個非洲國家中實行多黨制的只有3國，1994年已有48國。就是西方發達國家，在民主化潮流中也有很大進步。例如美國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四十多年前在《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中所提要求，現在就已基本實現。非洲裔美國人奧巴馬當選總統，更是明證。最後，也許是最重要